

福音教会与社会责任（一）

徐志秋教授

目前国内的教会处在一个地下的状态，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一旦国内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教会这种大规模的群体也要受到影响。我们是价值观目标都很相同的一个群体，在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我正在做一个研究，是关于美国的福音教会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的参与意识。我发现目前的中国家庭教会的资源并不多，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我们对社会的参与，在公共领域的声音，对社会的贡献，光盐效应，都会很不理想。在过去的大概一百年间，欧美的教会在逐渐自由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化的参与过程有一个很大的倒退，而这个方面在 1920 年的时候就已经影响了中国。1949 年开始有一个断层，这个断层有一个好处也有一个缺憾。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今天恢复到早期欧美福音派发展的趋势，在过去的一百年这种的福音派教会对于社会的参与是处在一种收缩的阶段，是不容乐观的。如果我们任由这种趋势在中国教会重演的话，那将会是非常遗憾的。我们希望从欧美教会的过失里面吸取教训，应用到中国的家庭教会，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扬长避短，洋为中用，学习历史的功课。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这个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今天先讲第一个部分，北美教会在自由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福音派教会对于社会参与方面的收缩。

（一）福音派教会，基要主义，时代主义

什么是福音派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难定义的概念，二三十年代在福音派教会里兴起的基要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一个反击，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时代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推波助澜，基要主义不主张社会参与。由于时代主义和基要主义交互影响，使得 1920 年以来的百年中，福音派教会在社会关怀方面有一个大的撤退，极度的收缩阵营，这是一个很不乐观的历史，存在很多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 1950 年以后福音派教会的新福音主义渐渐的重拾社会关怀传统，这个种子慢慢的演化，扩展，形成了一个全球的洛桑运动。

然后再看这个进程对中国的影响，基要主义在中国的带领人是王明道先生，时代主义的带领人是倪柝声弟兄，自由主义自由派神学在三自里面有些体现，社会参与就变成被三自被自由派所垄断，再加上倪柝声的三元论的思想导致对整个社会的参与极度的收缩，甚至超过了欧美。如果现在整个社会开放，有一个公共的平台让我们发声，我们会惊讶的发现已经不能够发声了，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处于地下状态，即使今天这个地下的状态不存在，我们也不会发声。我们的传统理念里太多的束缚，如果基要主义的这些基因不突破的话我

们就不会发声。不过，民国的传教士尤其是自由主义那一派在中国有非常好的社会参与的先例。

福音派是超宗派的新教基督徒群体，强调福音的核心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在恩典中称义。这是从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概念。这个字的本身可以追溯到新约的时代，教父时代很强调福音，宗教改革时强调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回到新约时代的教会，重新拾起了福音派的传统。福音派今天是一个很广普的教会，广普的定义从改革宗一直到灵恩派，只要不是非常极端的都可以归在福音派的这个定义里面。有时候改革宗和灵恩派之间有很多的争斗，彼此之间很多的张力，其实这是一种福音派内部的损耗，原因是我们对信仰的本身，身份不了解，就像是左手砍右手，两败俱伤的状态，这是很可悲的一种状态。

福音派的基本特征，首先是相信圣经无误，接受初代教会诸信条，包括初代教会的四大信条，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顿信经、亚纳他修信经等，在这个根基上成长起来的。注重普世宣教强调神学为教会服务，注重个人灵修、追求成圣、生命成熟等是有见证的活出信仰的。

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巴平顿(David W. Bebbington)，他不是个神学家，但是对福音派的定义很具有代表性，很多的福音派学者都非常的认同，他把福音派浓缩成四个很明显的基因，一是强调重生经历 (conversionism)，坚信人的生命需要改变，而且是基于福音信息而产生的大幅度调整；二是见证信仰的实际行动(activism)，信心通过行为表现出来，通过信仰见证、个人布道、海外宣教、社会参与等形式，彰显信仰、传扬福音； 三是以圣经为信仰圭臬(Biblicism)，坚信圣经无误或圣经可靠，把圣经作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 四是十架中心主义(crucicentrism)，像路德的十架神学， 强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相信耶稣刑罚代赎性救赎，相信耶稣复活、升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永恒盼望。根据这四个基因只要不是极端的改革宗，广普的改革宗都符合这个特性。灵恩派，浸信会，长老宗等也都有这个特性。用这四个基因去衡量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家庭教会都可以称做福音教会。

(二) 福音与社会

从历史上看，福音信仰与社会一直存在某种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仅是在改革宗的时候，在改革宗之前就有福音存在社会关怀属性。这个属性从耶稣教导的时候开始，在使徒行传里面看顾那些寡妇，做社会慈惠工作，有好的名声，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关怀属性；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提到在逼迫中怎样跟罗马政府互动的模式。这种社会关怀属性一直隐含在圣经里面，但是把它作为专题研究的人并不多。后来有一个学者饶申布什 Walter Rauschenbusch 写了一本书《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这个书名会让人一下子联想到这是自由派的做法，三自的做法，也是王明道先生所排斥的，正统的家庭教会

的牧师都会这么认为，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社会福音是有自由派的成分在里面，但是福音也确实有社会性的层面。

饶申布什告诉我们要回到新约的教导回到新约的文本，从里面挖掘出社会属性是有社会关怀的要求在里面。初代护教者的声音 Justin Martyr (A.D. 100-165) 尤斯丁殉道者，他在为受逼迫的初代教会向罗马政府护教的时候说 Christians would be found to be "moral, upright, and law-abiding citizens who are the empire's 'best allies in securing good order' ”。也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是那种道德高尚的正直的守法的公民，基督徒是保持社会良好秩序的忠实的公民。这听起来跟今天社会上的正能量主流维稳很相似的声音，但这个就是当时初代的教父们护教时所发出的声音，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给社会这样一个形象，我们可以参照这个文本学到很多的经验。基督徒应该是社会稳定的一个中坚力量，而基督信仰也应该是整个社会发展繁荣的根基。拜占庭帝国以基督教作为它的根基，政权担在救主的肩上，它是个不完美的中世纪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却维持了 1123 年的繁荣稳定，就是因为它建筑在基督信仰的这个框架里面。加尔文日内瓦的神治社会，基本上整个资本主义的萌芽契约精神都在那时形成，这是社会里面一个非常稳定的力量。清教徒移民美国时的理想是要在新英格兰建成山上之城，象征着救赎性的力量，建筑在基督教的理想之上。目前美国是处于政教分离的状态，福音派在美国当前政治生态里面的作用，这是很大的问题，是值得探讨研究，也是充满了危机的一种状态，福音派如果不做一些切割和理性处理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

（三）福音派的社会大撤退

福音派为什么在社会参与方面有一个大的收缩和倒退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基要主义的兴起，基要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其背景是传统的福音复兴主义 (revivalist evangelicalism) 受到现代主义的挑战，节节败退；基要主义产生于这样一种为信仰征战的时代背景，其首要任务是不妥协地重申福音信仰的基本立场，同时又坚定不移地抵制现代自由主义的侵蚀，并以击退现代自由主义的攻击为己任。基要主义的形成环境及对自身使命的认定，决定了基要主义的三种基本特征：信仰上的保守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倾向，以及与对手辩论过程中所呈现好战激进的 (militant) 属性。这个基要主义的特性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已经非常清楚的表现了出来。它有存在的合理性，在自由主义的攻击下面，需要保持信仰的完整性正统性，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发展为好斗，内敛，收缩，容易分裂。基要主义的教会一般都很小，在教义细节上面不和就分裂，今天的新教有四万个左右的教派，跟基要主义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十九世纪的美国，新教福音信仰在各个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根据宪法修正案，美国没有也不会设立国教，但新教福音信仰一直是美国半官方的主流宗教信仰。美国总统里面只有肯尼迪是天主教徒，其他的都是新教徒，现今总统川普也渐渐成为广普信仰的一

部分。对于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尽管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是福音派基督徒，但这确实是大部分民众的期盼。总统辩论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会问及他的信仰，在政教分离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但是每一次都会问到这个问题，以福音派为主导的民间，力量还是非常的大，他们期盼自己选出来的总统跟他们有一样的信仰。十九世纪美国大多数中小学和大学都教导广谱的福音信仰，有些大学要求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周间礼拜。

十九世纪末期，传统福音信仰受到了挑战。1890 年到 1930 年，美国主流福音信仰在公共领域经历阵痛、甚至面临解体。世俗公众开始质疑福音信仰，也就是说从 1890 年开始福音信仰开始在美国主流社会受到排挤，日益被边缘化，处在一个张力很大的状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态呢？

一个是科学主义对福音信仰形成挑战。1925 斯科普斯案(The State of Tennessee v. John Thomas Scopes)，也叫猴子审判(Monkey Trial)；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位代课老师约翰斯科普斯被指控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违反了该州的巴特勒法案(Butler Act)；案件审理地点在田纳西州的德顿市(Dayton, Tennessee),控方律师是柏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辩方律师为达柔(Clarence Darrow)；法庭判决辩方败诉，斯科普斯被处以一百美元罚金。此案被认为是基要信仰和科学理论之间的典型冲突案例，引发全国关注；尽管代表基要信仰的控方胜诉，但公众及媒体倾向支持被告，导致基要派声誉受损。大体而言，控方律师柏安赢得了诉讼，但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与同情。该诉讼之后，基要保守信仰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逐步降低，而现代自由主义和世俗化“进步”思潮日趋泛滥。这个案件产生了一个很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新教主流教派（路德宗、长老宗、卫理公会等）的教会人士逐渐回避福音信仰，与福音信仰划清界限，因为福音信仰毫不妥协地坚持超自然神迹的历史真实性、圣经启示的无误性等诸多“不合时宜”的信仰原则，从而被认为违背科学精神，与现代科学所信奉的自然主义背道而驰。

另一个是在救恩论方面，福音信仰坚持基督救恩的独一性，认为唯有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代赎才能得救，否则就会坠入永远的审判。在信仰日益多元化的现代时期，这类听起来独断、排他的教义立场，让福音派的许多朋友感到尴尬，逐渐保持距离。这也是福音派慢慢失去很多支持的原因，或者是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民众慢慢的疏远信仰。

基要主义所捍卫的核心教义包括耶稣的母亲玛丽亚童女怀孕、耶稣生平所行神迹的真实性、基督在肉身复活、基督代赎受罚的救恩(penal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基督的再临等。此外还有一个根基性的信仰议题，就是圣经启示的无误性，这是基要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拉锯论战的主要议题。现代自由主义受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的影响，质疑圣经某些段落或书卷的作者身份及历史真实性。文本批判是福音信仰在近现代所经受的一个巨大冲击，直接针对作为新教信仰核心的圣经启示，这些攻击让福音派信徒感受到切肤或锥心之痛，从而产生激进好斗、带着情绪化的回应和反击，所产生的历史现象就是基要主义运动。

与基要主义旗头并进的是时代主义，基要主义神学与时代主义(Dispensationalism)之间的关系是基要主义反击现代自由主义过程中所诉诸的理论武器之一，就是时代主义。时代主义认为，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历史，可以较为明确地划分出几个不同的“时代”（英文称作 dispensation，希腊文 ἀἰῶνας），这些时代包括纯真时代（从创造到堕落）、良心时代（从亚当到诺亚）、应许时代（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律法时代（从摩西到基督）、恩典时代（从五旬节到信徒被提），然后是千禧年时代。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上帝与世人之间的关系原则亦不相同。与注重连续性的圣约神学相比，时代主义所注重的是圣经各阶段的断层与不连续性。时代主义秉持字面释经原则(literal interpretation)。按照这一原则，上帝在以前的世代对以色列民族的应许必须得到字面意义上的应验，这种看法决定了时代主义在千禧年问题上的立场，就是必须有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千年国度，作为对以色列应许的实现。那么，基于前千禧年立场的历史框架，时代主义认为我们现今所处的是教会恩典时代，其总体走向逐渐趋于道德方面的败坏与信仰方面的悖道。前千认为社会要溃败到一定的程度，人类要邪恶到一个程度，像诺亚洪水爆发，引发上帝的审判，这种对时代的诊断对应了二十世纪初期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信仰）和世俗主义（道德）。

二十世纪初一战之前，欧洲教会所盛行的是后千禧年主义，它认为社会会越来越昌明，越来越发达，科学会把人类带进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人类进入黄金时代以后把上帝从天上引下来，自动进入千禧年，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后千禧年的信仰。前千禧年的溃败和后千禧年的乐观精神两者之间有非常大的张力，使得基要主义渐渐的在社会上失去了影响。因着对所处时代的有效解释，时代主义逐渐流行开来，成为基要主义的一大信仰内容。时代主义的几个特征：在道德层面，时代主义抵制世俗主义所带来的道德滑坡，强调个体德行的圣洁，主张与世俗社会分离；在信仰层面，时代主义坚持圣经无误原则，直接反对现代神学中的文本批判研究方法；在释经学层面，时代主义采用字面解释原则，对圣经中某些关于末后灾难的章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多次出现对末日具体时刻的极端性预言。他们释经层面，道德层面的保守，社会参与方面的保守，在与现代思潮较力的过程中，时代主义与现代社会日益脱节，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张力也日益加剧。

福音主义的反智苦果，对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都没有太多建树。在自然科学领域，福音信仰的声音相对微弱，福音派对许多议题都持有鲜明的立场，而且以圣经经文的支持作为最有力的证据，但他们对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缺乏深入的探究；他们并未意识到，对自然现象的深入研究与圣经启示未必存在矛盾。在面对社会危机之时，福音派应对的方式通常是发起一个运动，然后就退回堡垒；就如鸣的锣响的钹，缺乏持续有效的影响和更新改变的力量。美国的大学在建立之初都有教会背景，但受基要主义的影响，信仰传统主动或被动从大学撤退，神学院从大学中分离出来；福音派设立独立的神学院，大学教席中的福音派信徒日益减少，持福音信仰的学者很难在高水平世俗刊物发表文章。福音派声音逐渐在公共领域被边缘化，到现在依然是这个状态。

（四）新福音主义和重拾社会责任

这一现象在新福音主义(Neo-Evangelicalism)兴起之后有所改观，但整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二十世纪中期，福音派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正统信仰放弃社会关怀，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

他们在信仰立场上并不认同现代自由派（有的受到现代神学很深的影响，比如 Carnell），但他们主张社会关怀并非现代自由神学的独占领域；纯正的福音信仰包含社会关怀的部分，饶申布什的命题并不纯粹是自由神学的专利。主张正统信仰重拾社会关怀主要代表人物包括：Harold J. Ockenga; Charles E. Fuller, Carl F. H. Henry, E. J. Carnell , Billy Graham, etc。他们的主要贡献成立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机构：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 (NAE);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Christianity Today; Billy Graham 组织了 Crusade。代表人物 Carl Henry 写了一本书《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 (1947)》，号召福音派基督徒避免基要主义的分裂倾向，重拾社会关怀，更深更广地影响美国社会和文化。

后来这些新福音派的主要人物汇聚到一个运动里面，就是洛桑运动。1966 年经由葛培理布道团(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及今日基督教杂志(Christianity Today Magazine)的赞助及组织，在德国柏林举行过一次全球性福音议会（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代表人物 Billy Graham, Carl Henry, John Stott, etc. 介绍了福音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各处爆炸性的成长，使得教会重心从西方社会，开始转向非西方社会。1974 年七月，第一次洛桑会议，主题是让世界听到祂的声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它是整个福音派的一个连接合一产生的强大力量，150 个国家 2700 个代表与会，时代周刊 (Time Magazine) 称之为 “一个强大的论坛，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广大的基督徒会议”。发起机构是葛培理布道团和 Christianity Today；与会者的代表是 Francis Schaeffer, Carl Henry, John Stott, Ralph Winter。Stott 负责起草洛桑公约，确立异象，普世宣教。

1989 年 7 月第二次洛桑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170 个国家，3000 位代表。特别注意的是它重拾了社会服务，认为社会服务是整全福音的有机部分。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福音派在社会参与方面的大倒退之后到了洛桑的二次会议开始重新提出这一点，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提法，社会服务并不是自由派所特有的，而是整全福音不可少的部分。另一个是把灵恩派包含在福音派的里面明确的提出圣灵超自然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第二次洛桑会议有东欧、苏联教会代表参加，但有一个遗憾是没有中国教会代表，因为第二次洛桑会议的时间是在 1989 年 7 月。

2010 年 10 月第三次洛桑会议在南非开普敦，198 个国家 4000 位代表。签署了开普敦承诺。他们特别邀请了中国代表团，200 位中国家庭教会代表收到了邀请，但是由于特殊原因，没能成行。

我们盼望洛桑会议代表的包容性的正统信仰跟中国的家庭教会相融合，走一条中正的道路，重拾社会关怀传统！

讨论：

Q: 西方新福音派的反思和调整对中国的家庭教会有借鉴意义吗？

A: 新福音派这个群体在美国逐渐的淡化，被福音派的学者所取代了。现代派跟基要派的冲突非常的大，但他们苦心经营的结果结出了出色的果实。这个果实就是保守信仰的基督徒开始成批的成长起来，有很多做这个前期耕耘的人，正是在他们旷野的呼召下，基督徒投身于科学圣经的研究，以至于后来产生了几千多位的福音学者。大学里面科学理性主义慢慢衰弱，进入后现代时期，科学对自身产生质疑，对超自然现象不能解释渐渐成为现实，科学霸权慢慢的减弱，使得科学理性主义压制信仰的状态有所缓解。一方面是科学本身在慢慢的分化，另一方面是福音派优秀的学者在各个领域冒出来。但是，在中国因为政教关系的影响，基督徒人口是边缘化的，在知识的层面，社会参与的层面，如果说社会影响力的话，在欧美有很多基督徒的精英成长起来了，在一些领域是有话语权的，在中国是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Q: 我们不是社会福音派，但是不能用基要派的教条主义反对基督教的社会责任，把两者对立起来，这是形式上的属灵，实际上是对教会最大的破坏。

A: 这个是非常准确的。社会参与，社会关怀，并不是社会福音派所独有的，但是如果用社会服务来代替福音，或者把福音边缘化，都是不对的。这个原因是对圣经失去了信心，在现代主义自由主义的冲击下，自己信仰的阵地没有守住，从而退而求其次地用社会参与的形式试图挽回一点对社会的影响力，这个是得不偿失的。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出现整个信仰的大溃败，但是现在二十一世纪初已经完全不是这种情形了，纯正的福音信仰里面有社会关怀社会参与的义务和责任，这也是圣经里说基督徒是光是盐的教导。关于社会福音，还有一点可能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深受佛教的影响，提到宗教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佛教，像苦修，对社会事务不闻不问，六根清净，了断一切对社会的执念等，这种观念下意识的放到了基督教的身上。另一点是社会福音与社会主义，无神论连到了一起，它们确实有一点微妙的关系，我们不能说 50 年代的三自运动完全是政府逼迫的，他们那些人有一些社会福音的意识，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在里面，跟当时的社会改造是一拍即合的，这个使得家庭教会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福音增加了一层反感，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下的纠结。